



学术名家文丛

方龄贵学术文选

——元史丛考

方龄贵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云南大学出版社



学术名家文丛

方龄贵学术文选

——元史丛考

方龄贵 著

雲南人民出版社
雲南大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方龄贵学术文选——元史丛考 / 方龄贵著.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3. 8 (2015. 9 重印)

(云南文库·学术名家文丛)

ISBN 978 - 7 - 222 - 11152 - 3

I. ①方… II. ①方… III. ①中国历史—元代—文集
②元曲—文学研究—文集 IV. ①K247. 07 - 53②I207. 3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87932 号

出 品 人: 刘大伟

统筹编辑: 马维聪

责任编辑: 董郎文清

责任校对: 陈文珍 文 清 谭传武

封面设计: 郑 治

书名	方龄贵学术文选——元史丛考
作者	方龄贵 著
出版	云南人民出版社 云南大学出版社
发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云南大学出版社
社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邮编	650034
网址	http://ynpress.yunshow.com
E-mail	rmszbs@public.km.yn.cn
开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张	19
字数	300 千
版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2015 年 9 月第 2 次印刷
印刷	云南商奥印务有限公司
书号	ISBN 978 - 7 - 222 - 11152 - 3
定价	60.00 元

《云南文库》编委会

主任委员：李纪恒 赵 金 高 峰

副主任委员：钱恒义 张瑞才 陈建国 陈秋生

委 员：杨 毅 范建华 任 佳 李 维 张 勇

张昌山 王展飞 何耀华 贺圣达

《云南文库·学术名家文丛》编委会

主 任：赵 金

副主任：张瑞才 张云松 张昌山

委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文光 王展飞 尤 中 朱惠荣 伍雄武 伏润民

任 佳 刘 稚 刘大伟 汤文治 李红专 杨 毅

杨先明 何 飞 何 明 何耀华 邹 颖 张文勋

张桥贵 陈一之 陈云东 武建国 范建华 林文勋

和少英 周 平 周永坤 胡正鹏 段炳昌 施本植

施惟达 贺圣达 崔运武 董云川 谢本书

主 编：张瑞才

副主编：张昌山

编 辑：马维聪 柴 伟 杨君凤

作者简介

方龄贵（1918—2011），出生于吉林省前郭县，蒙古族。1938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系，1942年被北京大学研究院录取，向姚从吾、邵循正教授学习蒙古史与元史，1946年获硕士学位。毕业后在云南大学文史系任讲师一年。1947年转入昆明师范学院（现云南师范大学）历史系，先后任副教授、教授兼系主任、校图书馆馆长。兼任中国蒙古史学会理事、云南史学会副会长及顾问、云南孔子研究会顾问等职。1987年退休，仍笔耕不止。



先后获国务院特殊津贴、云南省政府社科优秀成果荣誉奖、国家新闻出版署优秀辞书奖、教育部中国高校优秀科研成果奖、云南省有突出贡献的老专家、云南省教育功勋奖、云南省优秀共产党员称号。2007年，云南师范大学与中国元史研究会、中国蒙古史学会，在昆明联合举办“中国蒙元史学术研讨会暨方龄贵教授九十华诞庆祝会”，会后出版纪念文集。

主要著作有《元朝秘史通检》《元明戏曲中的蒙古语》《大理五华楼新出元碑选录并考释》《通制条格校注》《古典戏曲外来语考释词典》《元史丛考》，参撰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纲要》。在《历史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70余篇，在《史学杂志》等刊物发表译文10余篇。

总 序

中共云南省委书记 李纪恒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一部承载责任与使命的好作品，必将是一部千古不朽的立言典范，也必将是一部历久弥新的传世教科书。千百年来特别是明代以来，许多贤人君子和名人大家在广袤的云岭大地耕耘、思考和写作，留下了闪光的足迹和丰厚的作品，足以飨及后进，启迪晚辈。在搜集、遴选和整理云南明代以来学术大家、学术名家著作的基础上，由云南宣传部门牵头推出了《云南文库》，这一丛书的面世诚为云南学术研究和出版界之盛事。

编纂《云南文库》是传承云南地域文明、提高云南文化自觉的有益尝试。“七彩云南”这片神奇的土地孕育了对中国乃至世界文明都有重要影响的古人类，造就了云南文化的丰厚积淀，从而构成了博大精深的云南文化艺术宝库。作为中华文化圈、印度文化圈和东南亚文化圈的交汇地，云南自古以来都不缺乏学贯中西的大师和博古通今的大家，从来都不缺乏魅力四射的光辉著作和壮美奇绝的文化遗存。其中，许多学术作品都凝聚了深邃的思想和超凡的智慧，体现了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彰显了有云南自身特点的知识谱系和学术传统。今

天，我们将历史长河中的明珠拾起，用心记载云南学术史上的灿烂篇章，正是为了守护云南优秀的地域文化，为了汲取进一步繁荣发展云南哲学社会科学养分和动力，进而筑牢云南文化自信的根基。

编纂《云南文库》是树立云南文化品牌、增强云南文化影响力的重要举措。云南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其悠久的历史文化、多彩的民族文化、独特的生态文化、包容的宗教文化，已经成为文化百花园中一枝流光溢彩、香飘四海的奇葩。千百年来，云南学者中英奇瑰伟之士以及众多寓居云南的外省学者念兹在兹，深植于云南沃土，扎根于传统文化，不懈探索、勤奋撰述，留下了一批经得住历史和实践检验的珍贵成果。特别是抗战时期，随着西南联合大学和相关研究机构的到来，昆明一时风云际会，云集了大批我国现代学术史上开宗立派的学术大师和著名专家，云南成为当时中国学术中心之一，诞生了大批学术经典。新中国成立后，云南学术研究取得很大进展，研究队伍空前壮大，学科建设卓有成效，学术成果日益丰硕，推出了一批享誉国内外的学术精品。近年来，《云南史料丛刊》《云南丛书》等一批历史文献和地方文献丛书相继刊印，云南文化的影响力和竞争力不断增强。今天，我们隆重推出《云南文库》，就是要为更多的人了解云南、熟悉云南、研究云南搭建一个平台和载体，为云南的经济社会发展、文化建设、文史学术研究等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为在更广领域传播云南文化、打造云南品牌、增强云南软实力创造更好条件。

编纂《云南文库》是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的有效途径。文化建设的根本就是要用健康高雅的艺术、用智慧明辨的思想、用善良温厚的德行启迪人、引导人。编纂《云南文

库》一个重要目的是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增进人民群众的幸福感。此次收入《云南文库》的著作，涉及哲学、历史、文学、语言、艺术、民族、宗教、政治、军事、外交等诸多方面，包含着丰富的自然、社会和人生哲理知识，体现了高度的人文关怀。阅读这些著作，有助于培育读者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心态，有助于引导人们去发现、享用、珍惜世界和人生之美，能使大众的精神世界得以滋养和美化、人格得以陶冶和熏陶、心灵得以安顿和抚慰、情感得以丰富和升华，从而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方面、多样性的审美需求。

编纂《云南文库》是推动云南跨越发展的必然要求。云南早在1996年就提出了建设“民族文化大省”的目标，是全国最早提出建设民族文化大省的省份之一。2000年，我省正式确立了“建设绿色经济强省、民族文化大省和中国连接东南亚南亚的国际大通道”的三大目标，把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纳入了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范畴。2009年召开的中共云南省委八届八次全委会，作出了把云南建设成为“绿色经济强省、民族文化强省、中国面向西南开放的桥头堡”的重大决策，把云南文化建设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2011年11月，云南省第九次党代会进一步明确了科学发展、和谐发展、跨越发展的发展主题，要求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当前，云南人民正豪情满怀地沿着建设民族文化强省的道路阔步前行，具有云南特色的文化模式已经也必将进一步焕发动人而耀眼的光芒。我们将以打造《云南文库》等一批社科品牌和文化精品为契机，继承优良传统，发挥优势，突出特色，以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宏大眼光，锐意进

取，积极开展学术研究，努力创造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历史的优秀学术成果和文化产品，更好地弘扬以高远、开放、包容的高原情怀和坚定、担当、务实的大山品质为主要内容的云南精神。

《云南文库》最终得以发行，首先是众位先贤心血和智慧结晶。在此，我们要对创造了云南学术精品并因此而为中华文化做出杰出贡献的学者们表示崇高的敬意！在《云南文库》的编纂过程中，相关编纂单位、出版单位和参加整理的学者，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兢兢业业地做好编校和出版工作，正是有了他们的辛勤劳动和精心工作，才有如今的翰墨流芳。在此，我要诚恳地道一声，大家辛苦了！《云南文库》从构想走向现实，离不开众多读者和社会各界人士的支持，我也一并向你们表示诚挚的谢意！同时，衷心希望同志们一如既往地云南文化建设献智献策，欢迎更多的同仁志士参与到云南文化建设的伟大事业中来！

谨为序。

前 言

本书收录了我的二十篇有关元史的文章，合约三十万言，题曰《方龄贵学术文选——元史丛考》，兹特略赘数语，以当前言。

《通制条格》一书，在研治元史及中国法制史等方面甚为重要，已著为《通制条格校注》行世（中华书局版），写作中为体例所限，有的条目注释，为避免繁冗，未能尽所欲言，往往以“别有考”了之。现本书所收《〈通制条格〉人名考异》《〈通制条格〉释词五例》《〈通制条格〉札记》等篇，即为弥补此项缺陷而作。又《条格》一书，行文未免文白掺杂，头绪纷繁，读者病之，或竟导致有所误解，因不惮烦琐，对《条格》本文条分缕析，归纳综合，草成《〈通制条格〉行文体例初探》，略发其凡，以释群疑。凡此读者似无妨以《通制条格校注》补编视之。

云南是一个多民族省份，又跟元史有其特殊关系。云南至今不但有蒙古族居住，而且现存元代碑刻和有关历史文物，颇不在少。我长期在云南生活和工作，对云南元碑及有关元代云南史事的探考，不能不是我的研究课题。这方面，本书收了《阿湍公主诗中夷语非蒙古语说》《元述律杰事迹辑考》《〈云南王藏经碑〉新探》《云南元代白话碑校证》等四篇，此外尚有《大理五华楼新出元碑选录并考释》一书（云南大学出版社版），分上、下两编。其中上编选录部分，由我和王云先生合作。下编考释部分乃我所独撰，计收有《大理五华楼新出元碑的发现及其史料价值》《大理五华楼新出宋元碑刻中有关云南地方史的史料》《关于所谓元以前云南不知

尊孔子的有力反证——新出《大理圜故高姬墓铭碑》读后》《忽必烈征大理史事新证——新出元碑〈故大理□□氏躬节仁义道济大师墓碑铭并序〉考释》《〈大理路兴举学校记〉考释》《关于郝天挺和云南的关系及其他》《侖智高死事新证——新出元碑〈故大师白氏墓碑铭并序〉考释》《〈大光明寺住持瑞岩长老智照灵塔铭并序〉考释》《云南现存北元宣光纪年文献考述》《关于北元宣光年号的考证》《新出元碑杨孝先墓志考释》等篇。有关心这方面史事者，可参阅。

元曲作为文学作品，不但在中国文学史上有其重要地位，而且作为史料，对研究有元一代政治社会情状及语言方面，亦自有不可忽略的价值，从广泛的意义上说，治元史对元曲也应该给以足够的重视。首揭此义者为王静安（国维）先生，他在其名著《宋元戏曲史》中有云：“元剧自文章言之，优足以当一代之文学，又以其自然故，故能写当时政治社会之情状，足以供史家论世之资者不少。又曲中多用俗语，故宋、金、元三朝遗语所存甚多，理而董之，自足为一专书。”微言谏论，语重心长。间尝略师其意，草成《元曲中有关元代市井行业及社会风俗史料初探》，收入本书。此外并著为《元明戏曲中的蒙古语》（云南人民出版社版）、《古典戏曲外来语考释词典》（云南人民出版社、云南大学出版社版），收录元曲中的若干蒙古语（兼及明、清戏曲中的蒙古语、满——通古斯语族、突厥语族有关诸语乃至波斯、阿拉伯语），盖均亦不过片言只语，殊不足语于王氏所期许一家之言的专书。鸿篇巨制，请俟来哲。

学如不及，本书所收拙作各篇，所有疏失不妥之处，统希读者有以进而教之。

目 录

Contents

《元史》纂修杂考	1
《新元史·云南行省宰相年表》补正	41
记所见阮惟和《元秘史地理今释》抄本	63
元曲中有关元代市井行业及社会风俗史料初探	76
《通制条格》新探	101
《通制条格》人名考异	122
《通制条格》释词五例	138
《通制条格》札记	149
《通制条格》中有关云南史料举证	162
《通制条格》行文体例初探	169
读《黑城出土文书》	186
为“不怕那甚么”进一解	194
阿谿公主诗中夷语非蒙古语说	199
元述律杰事迹辑考	205
《云南王藏经碑》新探	228

云南元代白话碑校证	241
方国瑜先生对元代云南史地研究的贡献	255
《郎潜纪闻三笔·有裨实用之国语》点校献疑	260
必须认真对待史料	
——读《中国经济史论丛》《中国古代经济史概论》	
札记一则	265
我和蒙元史研究	271
学术年表	285

《元史》纂修杂考

洪武元年（元顺帝至正二十八年，即公元1368年）明兵克大都，得元《十三朝实录》，次年即诏修元史。二月丙寅开局于南京天界寺，八月癸酉告成，计一百八十八日。但顺帝一朝三十六年史事，无实录可征，因遣使者四出采辑，洪武三年二月乙丑再开局，七月丁亥书成上进，计一百四十三日，两次修史，通计共三百三十一日，前后不足一年^①。书成之日，距顺帝之卒不过三个月^②。由于始事之骤和成书之速，迫于时日，疏漏在所难免，书中或一人两传，或有的该立传而没有立传，并译名不一，考订不审，如此等等，在诸史中历来最受訾议，后世改修的遂有多家。《新元史》且与旧史并列入二十五史^③。但平心而论，在《十三朝实录》《经世大典》等久佚的今天，《元史》仍是治蒙元一代史事的第一手史料，其价值绝不是改修各史所可取代的，对它的纂修，值得做认真的研究。现仅就有关数事稍加申说，其关于全面的考察，则请俟异日。

一、《元史》纂人异闻

《元史》的纂修，以李善长为监修官，而宋濂、王祚为总裁，实主其

① 参见《明太祖实录》卷三九“洪武二年二月丙寅”条，卷四四“洪武二年八月癸酉”条，卷五四“洪武三年秋七月丁亥”条；宋濂《宋文宪公全集》（《四部备要》据嘉庆严荣刻本排印本）卷一《元史目录后记》；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九《元史》；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九《元史》。

② 参见《蒙兀儿史记》卷一七《妥欢贴睦尔可汗本纪》“至正三十年夏四月丙戌”条；《新元史》卷二六《惠宗纪》“至正三十年夏四月丙戌”条。

③ 见《新元史》卷首徐世昌序。

事。据宋濂《进元史表》和《元史目录后记》^①所载：第一次入局的史臣还有汪克宽、胡翰、宋禧、陶凯、陈基、赵埏、曾鲁、赵汭、张文海、徐尊生、黄箴、傅恕、王铤、傅著、谢徽、高启等十六人。第二次入局则有赵埏、朱右、贝琼、朱世濂、王廉^②、王彝、张孟兼、高逊志、李懋、张宣、李汶、张简、杜寅、俞寅、殷弼等十五人，其中两次入局的只有赵埏，而仍以宋濂、王祎为总裁。是先后参加修史的合宋、王共为三十二人，其中宋濂、王祎、汪克宽、陶凯、曾鲁、高启、赵汭、胡翰、赵埏《明史》各有传，贝琼附宋讷传，高逊志附王艮传，宋禧、陈基、张文海、徐尊生、傅恕、傅著、谢徽、朱右、朱廉（当即朱世濂）、王彝、张孟兼、李汶、张宣、张简、杜寅则附见《赵埏传》。其余黄箴、王铤、王廉、李懋、俞寅、殷弼等六人无传。据此，两次入局纂修《元史》之人甚为分明，应无疑义。但平日读书，偶涉纂史诸人，亦复见有不同。其间情况种种不一，足广异闻，现就检索所得，略加排比，辨释如下：

1. 危素

何乔远《名山藏》臣林记《危素传》：“字太朴，金溪人……明兵入府藏，垂及史库，素言抚镇吴勉輦出之，既与学士张以宁等谒大将军军门，送至京，高帝以为翰林侍读学士……时素年六十八矣……命与宋濂同修元史，顷之坐失朝免居……”明言危素与修《元史》，可是《明史》卷二八五文苑《危素传》《危太朴集》及宋濂所撰《故翰林侍讲学士中顺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危公新墓碑铭》^③，均一语不及于其与修《元史》事。宋濂是纂修《元史》的总裁，危素倘真与修《元史》，墓碑中不应阙载。又贝琼《送危於臆赴安庆教授序》云：“若临川危公太朴，又登文王之门，博学而多艺……及仕于朝，为中书参知政事，为翰林承旨，属大兵四起，天下之势日蹙，而预大政，决大议，中外倚之为重，其所施又有过于诸臣

① 见《宋文宪公全集》卷一。

② 《明史》卷二八五《赵埏传》无王廉名。卷七一《选举志》，卷九八《艺文志》、卷三二一《外国传·安南》所见之王廉，均即此人。朱彝尊《曝书亭集》卷六二《王廉传》说他“洪武二年用学士危素荐，授翰林编修，明年，与修元史”。是曾与续修《元史》无疑。

③ 见《宋文宪公全集》卷二七。

者，岂独文章而已哉！余以少时心识其名，皇明洪武三年，始识于京师，则既老矣。然耳聪目明，与学者商榷古今，终日无倦色。时余预编史事，弗暇与之周旋，未几而公卒。”^① 贝琼是第二次入局修史的人，危素如曾与修《元史》，文中何竟不道及之。朱彝尊《明诗综》卷三危素小传注引《静志居诗话》云“然《元史》成日，曾未获与笔削”，所说可信。《明史》卷二四二《洪文衡传》附何乔远传说：“乔远博览，好著书，尝辑《明十三朝遗事》为《名山藏》，又纂《闽书》百五十卷，颇行于世，然援据多舛云。”此处殆亦“援据多舛”之一证。不过，危素和元史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关系的。一是有保存《十三朝实录》之功，而实录是第一次修史时的主要依据。墓碑说：“当时事势已不可为，及再任翰林，仅一日而大兵入燕，公曰：‘国家遇我至矣，国亡吾敢不死！’趋所居报恩寺，脱帽井傍，两手据井口，俯身将就沉。寺僧大梓与番阳徐彦礼大呼曰：‘公毋死！公安死？公不禄食四年矣，非居位比，且国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国之史也。’力挽起之。已而兵入府藏，垂及史库，公言于镇抚吴勉，辇而出之，由是累朝实录无遗阙者，公之力也。”二是危素曾有元史稿之作，今不传。墓碑：“公博学善文辞，至正中独以文鸣天下，凡朝廷制作，皆自公出……有文集五十篇，奏议二卷，宋史稿五十卷，元史稿若干篇，藏于家。”又《明史》卷二八五文苑《张以宁传》：“元故官来京者，素及以宁名尤重。素长于史，以宁长于经。素宋元史稿俱失传，而以宁春秋学遂行。”《名山藏》以危素与修《元史》，或当由此致误。

2. 杨维桢

明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二〇史乘考误云：“野记谓太祖召杨维桢，将用之。维桢八十余矣。作《老客妇谣》以见志，或劝上杀之，上曰：‘老蛮子止欲成其名耳。’不僇而遣之，一时颇高其事，诸学士俱有诗，詹同文作传，皆假借之，所谓非义之义也。予尝有论暴其罪。按维桢预修《元史》。史成当授官，以老辞归，卒，年七十六，非八十余也。”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一三“元史”条：“洪武元年，上命起居注宋濂、漳州府通判王祯为总裁，征山林遗逸之士汪克宽、胡翰、赵沍、陶凯、高启等

^① 见《清江贝先生文集》卷二〇。

同修元史。自元统、至正间事无可据，遣儒士欧阳佑等诣北平采访，明年再修，仍濂、祎总裁，而以赵坝、朱右、贝琼、张孟兼等同修，然备员而已，笔削皆取上裁，且见文稍深古者辄芟去，曰：‘恶用是！独即旧志为书可矣。’时杨维桢年七十余，亦聘至修史，史成，作《老客妇谣》见意，放归。”卷三四吏部·征聘：“以文学聘至者王祎也，聘至而留为后用者方孝孺也，聘至修礼，书成而不受官者梁寅也，聘至修史，书成而不受官者杨维桢、陶宗仪、赵汴也。”

两书都说杨维桢与修《元史》，史成不受官而还，考《明史》卷二八五文苑《杨维桢传》云：“洪武二年，太祖召诸儒纂礼乐书，以维桢前朝老文学，遣翰林詹同奉币诣门。维桢谢曰：‘岂有老妇将就木而再理嫁者邪！’明年复遣有司敦促，赋《老客妇谣》一章进御曰：‘皇帝竭吾之能，不强吾所不能则可，否则有蹈海死耳。’帝许之，赐安车诣阙廷，留百有一十日，所纂叙例略定，即乞骸骨，帝成其志，仍给安车还山，史馆胄监之士，祖帐西门外，宋濂赠之诗曰‘不受君王五色诏，白衣宣至白衣还’。盖高之也。抵家卒，年七十五。”是维桢应召系为纂礼乐书，不是修史。按：《老客妇谣》，钱谦益《列朝诗集》甲集前编收之，亦见《铁厓逸编注》卷三，不录。《列朝诗集》诗前小传，文字与《明史》本传略同，唯于留百有一十日，下文作“礼文毕，史统定，即以白衣乞骸骨”云云，其“史统定”三字，颇发人深思。考纂礼书与修《元史》均开局南京天界寺，曾鲁、汪克宽、胡翰、陶凯等人于初修《元史》毕事后，亦得同与纂修^①，宋濂且一时亦曾预于修礼^②，以后两局人员，也时有过从往还^③，杨维桢之应召，约略同时。维桢还山时，史馆诸人复祖帐西门外，为之饯行，宋濂并有诗赠他。维桢之于宋濂为前辈，又老于前朝掌故，则宋濂或曾以修史诸大端，征询及之，亦理中或有之事，所谓“史统定”或即此之类，但说维桢与于修史，史成不受官而还，则为事所必无了。

① 参见陈建《皇明通纪从信录》卷五“洪武三年七月”条，又《明诗综》卷七徐一夔小传引《静志居诗话》。

② 《明史》卷四七《礼志》。

③ 参见《赘叟遗集》卷二《书童烈妇传后》。